



shine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
Shangha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Economy

中国发展展望

中国迈向怎样的市场经济

主编 / 陈宪 副主编 / 周伟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ine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
Shangha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Economy

中国发展展望

中国迈向怎样的市场经济

主编 / 陈宪 副主编 / 周伟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发展展望:中国迈向怎样的市场经济/陈宪主
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743-0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中国经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研究 IV. ①F1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2739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张志全工作室

中国发展展望
——中国迈向怎样的市场经济

陈 宪 主编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25 插页 4 字数 174,000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743-0/F·2489

定价 58.00 元

主 编 陈 宪

副 主 编 周伟民

编 委 会 (按姓氏字母排序)

陈 宪 陈飞翔 陈宏民 何振宇 黄少卿

陆 铭 罗守贵 潘英丽 钱军辉 施 浩

史占中 尹海涛 张 磊 周伟民

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字母排序)

Richard Freeman 胡永泰 John Walley

万广华 吴敬琏 姚 洋 周 林

序

2016年6月19日，初夏的上海闷热多雨。但这一天，对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发院”）却是重要的一天。当天下午的“安泰问政”论坛上，中发院资深教授潘英丽和同济大学钟宁桦教授对中国经济去杠杆问题作了专场报告。晚上，中发院聘请了多位活跃在中国经济研究第一线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为“特聘研究员”。同时，樊纲教授、胡永泰教授、姚洋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共同出席了中发院组织的“安泰问政”特别活动，就“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正如在论坛上胡永泰教授所说的那样，经济学很像医学，它既有研究一般原理的性质，也有像医生一样需要有临床治病的医术。当代中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亦对学术研究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体制特征也使得中国发展出现了纷繁复杂的综合征，而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知识准备和研究支持却严重不足。

作为对于时代所需的回应，中发院的学者们形成了“就重大

问题发声”的共识。作为这个共识的行动之一，中发院创立《中国发展展望》集刊（China Development Outlook，以下简称“集刊”），并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集刊将集中呈现当年有关中国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作者以中发院研究人员和参与中发院各类活动的学者为主。集刊将包括以下几个篇目：

篇目一：年度主题

该篇目围绕对中国发展特别重要的主题，发表若干篇专题评论。第一辑的主题是“中国城市化的困境与战略”。

篇目二：发展评论

该篇目既发表有关中国发展某一方面重大问题的政策评论文章，也发表基于数据分析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研究性论文，还发表基于研究文献和学术思潮对于中国发展的评论。

篇目三：研究报告

该篇目发表有益于理解中国现实和相关政策动向的研究报告。

篇目四：安泰问政

该篇目精选中发院“安泰问政”论坛的重要内容，发布国内外重要学者对于重大政策问题的评论。

篇目五：研究对话

该篇目以研讨对话形式发表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学（家）如何参与政策研究的探讨。

愿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和《中国发展展望》集刊能够始终在正确的时间发出有力的声音。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

目 录

I	年度主题
3	市场经济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成功 陈 宪
15	发展评论
17	社会需要好金融 潘英丽
27	中国经济不能以周期为托辞三谈 陆 铭
45	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增强市场竞争秩序 ——基于政府—市场关系视角 黄少卿 郭洪宇
61	中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持续推进国有部门的市场化 改革 钟宁桦 吴冰雁
71	制度环境、机会空间和组织路径形成：以中国军工企业 “军转民”为例 井润田 Mary Benner
79	研究报告
81	教育、城市和大国发展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区域战略 陆 铭
107	从战略高度关注与破解金融资源错配问题 潘英丽
123	三大红利、后发优势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黄少卿

139 **安泰问政**

- 141 深圳、杭州将是中国新经济策源地 陈 宪
- 145 上海经济发展知识密集特征还不是很明显，郊区拖了
 后腿 罗守贵
- 150 以创新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曾赛星 林 翰
- 154 从供给侧改革视角探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何振宇
- 158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重塑政商关系 黄少卿
- 166 户籍制度阻碍我国经济结构再平衡 钟宁桦
- 175 如何重振东北经济 陆 铭
- 181 扩大汇率弹性宜早不宜迟 钱军辉
- 185 分享经济能够颠覆资本主义吗 陈 宪
- 196 要素配置效率问题不容忽视 邹至庄 袁志刚等

203 **研究对话**

- 205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周林等
- 221 理论创新、经验研究和大国发展战略
 ——陆铭教授访谈

年度主题



市场经济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成功

陈 宪 *

由三位美国知名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戴维·莱布森、约翰·A. 李斯特共著的《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第22章，问了一个经济学越来越不能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并非整个世界都已经发达起来？”（这一章的标题）现今世界大约200个国家，被公认的发达国家不到20个。换一个角度，市场经济在小部分国家成功了，在大部分国家没有成功。因此，对于发达和不发达、成功和不成功原因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孜孜以求的课题。

一、制度假说得到肯定

阿西莫格鲁等将发达的原因分为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直接原因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提出来的，包括三个方面：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生产函数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实物资本 K 和劳动 L 。现代分析视角是人力资本 H 。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 T 内

* 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生化。“然而，仅仅基于这些原因的解釋立即引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与另一些国家相比积累了更多的实物资本，进行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开发和采用了更好的技术？毕竟，如果投资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采用先进技术就能大量增加GDP，那么，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不都想这么做吗？为什么并非整个世界都像美国或西欧国家那样发达呢？”由此，他们意识到，这三个方面的差别即不同的投入水平，只是经济发达程度差异的直接原因，因为它们没有对这些投入水平为什么高或为什么低作出解释。

因果关系总是复杂的。阿西莫格鲁等作了更深入的挖掘。“为了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我们有时需看看表面下隐藏着什么。”这些真实原因被他们称为发达的根本原因。根据前人和他们的研究，根本原因归为三个假说：地理、文化和制度假说。

地理假说被否定了。“如果地理是繁荣（或不繁荣）的主要原因，那么，世界上的穷国就没有什么理由期望生活水平有多大的提高了。推理大概是这样的：它们永远处于不利地位，我们不应该预期它们会很快赶上世界其他地方。”这并不符合发展的事实。新加坡地处赤道，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李光耀曾经十分强调空调对于新加坡现代化的作用。一个制冷技术就改变了地理位置的劣势。“交通技术上的大规模投资或疾病根除可以部分地缓解这些地理上的劣势。”

文化假说受到怀疑。“由于特定的共同经验、宗教教育、家庭纽带的力量和不成文的社会规范，不同社会对激励的反应不一样。文化被认为是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偏好及信念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而这些差别在决定经济表现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例如，

有些社会的价值观可能是鼓励投资、努力工作和采用新技术，而另一些社会可能是迷信盛行、不信任新技术、不鼓励努力工作。”提出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联系最著名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认为，西欧工业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教。另一个版本比较了美国和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伊比利亚文化，前者被认为有益于投资和新技术的采用，后者被认为活力要低一些且更为保守，进而解释北美洲和南美洲经济发展的差异。20年前，塞缪尔·亨廷顿新造了“文明冲突”这个术语，概括他所认为的21世纪的关键冲突——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他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文化在决定经济发达中起着中心作用。阿西莫格鲁等指出：“社会的文化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尽管文化的变化缓慢，但它们的确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文化影响增长，但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优势文化、“中心”文化造就发达，其他文化就注定不能成功。

制度假说得到肯定。“制度假说宣称，人们为组织社会所选择的方式的差别——即那些影响社会中的个人和企业面临的激励的差别——是导致他们的相对繁荣程度有所差别的原因。例如，当市场将个人配置于他们具有最高生产率的职业时，当法律和规章鼓励企业投资于实物资本和技术时，当教育系统使得人们能够并且鼓励人们投资于他们的人力资本时，经济体将比其制度未能这么做时生产更高的GDP和更加繁荣。”阿西莫格鲁将他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提出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掠夺性经济制度，运用于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分析，以证明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活动，掠夺性制度抑制经济活动。制度因素而非地理因素、文化因素，是解释国家间差别的核心。

二、制度是怎样作用于增长和发达的

在阿西莫格鲁等的研究框架中，制度是唯一得到肯定的根本原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包容性制度是通过怎样的中间环节作用于增长的呢？如果说制度通过作用于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这三个要素就能够推动增长的话，那么，其作用机制的中间环节是什么？技术不转化为产业，能够作用于增长并通向发达吗？

实物资本是技术的载体，技术是其核心价值；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是人力资本的载体，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是人力资本的核心价值。这里，将问题的讨论归结到技术。技术能否对经济增长起作用，关键看其能否形成产业，即技术革命能否形成工业革命乃至产业革命。工业革命始于从纺织业开始的技术变革，然后扩展到其他领域，著名的蒸汽机技术奠定了现代生产和铁路的基础。可见，技术革命要通过创造巨大的产业规模，才能持续地推动增长，使人类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开始于18世纪后半期而不是其他时间？下面是阿西莫格鲁等的解释。

工业革命这样复杂的社会和经济过程当然不止一个原因。人们对工业革命的产生提出了很多解释，其中，最为集中的解释是英国当时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工业革命的关键特征是新技术得到开发，并被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在实践中采用。若没有受到保障的产权，企业家就没有动力追求和从事这样的创新。由于英国已经有了一个发展良好的市场体系，这些创新又是有利可图的，那些能采用新技术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的企业家能够到达一个更大的市场，并赚取可观的利润。英国也有一个允许新技术发明者保护

他们产权的专利体系。对新思想和创新的保护，就像对其他经济资产的保护一样，是英国的创新和技术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与18世纪的其他国家相反，英国还允许相对自由地进入不同行业。尽管不同的利益集团力图阻挠竞争者的进入，且有时他们的努力取得成功，如羊毛织物制造商暂时说服了议会禁止进口棉布，但是，这些进入壁垒常常是短命的。英国社会的这些制度特征是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特别指出的是，英国的经济制度还得到了政治制度的适当支持。重大政治改革已经在这些经济制度发展之前发生，特别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它引入了君主立宪制和对君主的政治势力的许多限制。在“光荣革命”中确定下来并在下一个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制度，是支撑工业革命的包容性制度得以建立的保障。由此也表明，持续促进增长的制度是广义的，是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

讲到这里，我要提到对上述观点持不同意见的一位经济学家和他的一本书——文一和《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书的正文前有几段“核心语录”，代表他的基本观点。其中有一段写道：“‘自由’市场并不自由，也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一个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文一引述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在2012年的一段话：“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也就是说，直到现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还没有公认的解释。文一的解释是，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培育自己的商人阶层，并为本国制造业创造了世界市场的国家，都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除了英国，还有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和

亚洲的日本。

文一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与英国工业革命的路径高度吻合。而且，他也对比了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工业革命，发现它们的路径也很相似，共同的因素是——原始工业化阶段：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力，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制造业在全国各地全面开花，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助跑；第一次工业革命：劳动密集型规模化大生产方式的出现；“工业三位一体”繁荣：克服能源—动力—运输瓶颈，并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助跑；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规模化生产所需的中间品和生产工具（比如水泥、钢铁、煤炭、化工产品等）；农业现代化并进入福利社会。经济福利：免费教育、医疗，社会安全网，服务业繁荣。政治福利：各种天赋人权（包括残疾人，甚至犯人）。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致沿着这个路径前行，目前已经处于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其产业升级正处于由中端往高端进发的冲刺阶段。

文一将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指向强政府及其正确的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是创造市场。他没有将产权制度看成第一位，而是将国家战略置于首位。这是不同的观察角度。国家战略也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其实，文一的观点与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相融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他的独到之处在于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因为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并且最终对造成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在诺斯看来，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或经济组织的内在活动倾向，又要说明历史上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如果说诺斯把自己的国家

理论称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那么，文一的理论就是“实施工业化战略的国家理论”。

我认为，文一的观点与包容性制度假说并不矛盾。文一认为，制度是内生的。民主法制等制度是工业革命的结果，不是原因。这有其正确性。但是，一方面，如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就已经内生了有助于工业革命的制度，对于工业革命，这不是结果，而是原因；另一方面，诺斯将制度变迁描述为两种基本路径：所谓“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又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两种方式类似外生与内生，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就像作为索洛剩余的技术进步最初是外生的，罗默通过揭示经济体系内在激励，将其内生一样，早期的制度经济学不认为经济体系内部存在制度需求，故将制度作为外生，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和技术参数的函数，但是，制度在增长过程中是有需求的，进而也是内生的。

三、所有权制度和金融制度是关键的制度

在制度体系中哪些制度的作用最关键？基本与诺斯的产权理论同出一辙，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2000年出版的《资本的秘密》中指出，所有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在一些国家成功的主要原因。

索托和他的研究团队在亚洲、非洲、中东地区以及拉丁美洲挨门逐户地调查，收集了大量数据和事实，试图证明，那些贫穷